

北京历史文化
遗产论集

抱甕遺稿集

商子之題



包世軒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1年北京市文物局领导、专家与18区县文物普查培训班学员合影



侯仁之先生带领研究生考察门头沟文物（1985）



北京市文物局举办中美暑期古建筑研习班（1986）



1966年4月著者（左二）与同学在天安门广场



调查沿河长城（1982）



1981年陪同于杰（右三）、赵光林（左四）考察龙门洞
贝币出土地点



陪同北大许大龄先生（前排左三）考察戒台寺



1982年4月黄草梁上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地上科人员测绘长城



1985年与钟敬文（中）、张紫晨教授考察千军台幡会



1981年陪同罗哲文（左一）考察门头沟长城（白羊石虎村）



1993年春季陪同侯一民（左四）、王金鲁局长
（左三）考察建造侯一民画室



1995年妙峰山庙会上钟敬文（中）、马学良（左二）、
舒乙（左三）、于是之（右三）、刘曙光（左一）



1986年4月20日妙峰山碧霞元君殿立架仪式后合影



1993年蓝靛厂“同心合善蝴蝶少林会”的老都管们（妙峰山上）



1974年春著者在秘魔崖拓宝廷刻石情景



1974年著者在八大处访问昌月老和尚



1980年拓白瀑寺圆正法师塔铭



1980年拓大周朝元元年幢塔



1985年陪同侯仁之先生(左三)考察门头沟文物



与清华大学建筑系吴良镛、吴煥加、郭黛姮教授考察云居寺（1986年）



潭柘寺建寺1700周年庆典大会上北京
佛协会长印法师宣读《和谐宣言》
(2007年)



1997年在赵县柏林寺请益净慧大和尚
(左三)



2006年陪同南武当派掌门人游玄德
道长(右二)在滴水岩



2006年5月中国民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团代表合
影。周华斌(右二)、赵书(右四)著者(右一)



2005年参加妙峰山学术研讨会的商传教授(左一)、
刘铁梁教授(左二)



指导恢复崇文区兵部杠箱会会众汇报演出后合影留念(2008年)



兵部杠箱会传人黄荣贵、赵宝琪等合影

北京
历史
文化
遗产
集论

抱瓮灌园集

包世轩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抱瓮灌园集 / 包世轩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3

(北京历史文化遗产集论)

ISBN 978-7-5402-2596-4

I. ①抱… II. ①包… III. ①文化遗产 - 北京市 - 文集

IV. ①K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132 号

抱瓮灌园集

著 者：包世轩

责任编辑：夏艳

出版发行：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100054

电话传真：86-10-65240430（总编室）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790 千字

印 数：001—1000 册

版 别：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2596-4

定 价：120.00 元（上、下册）

燕山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燕山版图书，印刷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三十多年前，初识世轩兄，从友人处得知，他是一个经常会独自带上干粮，到处去踏寻古迹的文物爱好者，有时甚至在荒山野寺，拓碑终日，置饥渴而不顾。此后不久，世轩兄调入门头沟区文化局从事文物工作，于是我们成为同道中人。以后接触更多，让我深深感到他还是个性情中人，从此结为好友。当时我们还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如今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我已年逾花甲，世轩兄小我几岁，也是年近六旬之人了。

这三十多年来，世轩兄从一个爱好文物事业的青年成长为一名视野独特的文物专家，与他在文物领域里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世轩兄一直在文物系统工作，先后在几个文博单位担任着领导职务。事业与地位在变，可是他这个人却一点也没有变，痴迷于文物与民俗的兴趣没有变，每逢友人相聚小酌，话题依然只有文物与民俗。因此这次拿到世轩兄书稿翻阅时，觉得这里面的文章有些已经耳熟能详了。但是当我再慢慢读来的时候，却又深为其中精巧之考证、精细之论述而感到耳目一新。

世轩兄对自己所钟爱事业的那份执著实在令我钦佩。每发现一件新文物，发现一个典型民俗文化事象、一座寺庙未解的历史问题，他都要寻根问底，不考察清楚是不肯罢休的。这本文集便是世轩兄治历史文物、民俗文化研究，尤其是北京佛教史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多年来那种寻根问底精神的体现。

其中明代重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是印度僧人室利沙，解决了几百年的历史悬疑！

世轩兄对京西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其实我们这些在京西工作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情结，不过我没有世轩兄那样执著。在潭柘寺山下生活了八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成天挂在嘴边，也没曾想过要去探究这座古寺到底始建于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可是世轩兄做了。他经过认真的考证，把潭柘寺建寺时间确定为西晋永嘉元年（307）。我没有这方面的研究，也许将来会有新的考证结果，但至少在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结果没有出现之前，使这座享誉天下的古寺总算有了一个可以举行建寺纪念大典的日子。世轩兄还爱谈妙峰山，谈五顶娘娘庙，谈戒台寺；谈千军台幡会，谈

鲁谷，谈斋堂村……虽然这部《北京历史文化遗产集论》研究内容不局限于京西，但是他对于京西文物掌故如数家珍的了解，已见诸文集之中了。

说到考证文物，想起一件往事，记得一天世轩兄找到我兴奋地说，已考知门头沟淤白村白瀑寺幢塔署“大周朝元元年”之来历，此离奇之年号“大周朝元”，乃金、元之际门头沟地区一临时政权之年号。这确是一件十分新奇有趣的事情，当元朝未建都于大都，而金朝已败退开封的那一段时间，北京西山还曾有过这样一个地方政权，这对于北京史的研究，当有填补空白之意义吧。

世轩兄的考证文字，于考证之中，将当年友人、领导的交往活动夹叙其中，读之仿佛又回到当年。人老更易有怀旧之情，看着世轩兄文集，那一步步走来的日子，显得更让人留恋了。

世轩兄命我为这本集子作序，书名抱瓮灌园，盖其心血之所成，如同一位辛勤的园丁，其抱瓮所灌之园，今已蔬果丰满，瓜熟而蒂落矣！是为序。

商传于庚寅暑中

(商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著明史专家 社科院博士生导师)

关于世轩先生佛教史研究方面的几点评述（代序）



持续镌刻一千余年的房山石经，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在房山石经的发展进程中，贡献最大的是两位僧人：第一位是开创者隋朝的静琬，第二位是辽代的通理。静琬的行迹，有唐初《冥报记》的记载和石经山上静琬本人留下的几方题记，虽然十分简略，但人们可以从中大致了解这位可敬的佛教大师概略的生平和镌刻石经的背景、目的。相比之下，有关通理的记载，长期以来却只有一鳞半爪的文字，其中还包含有谜一样无法理解的问题。这是房山石经研究中的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没有想到，1998年包世轩先生发表《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一文，文中刊布了这方珍贵辽碑的拓片和录文，让我们不仅知晓了通理大师的生平梗概，而且了解了辽代禅宗的传播脉络和礼忏活动在辽代佛教中的重要影响，房山石经中通理弟子刻经附录的那些谜一般的禅宗偈语和礼忏仪文，也因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既是房山石经研究中的重要进展，又是辽代佛教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突破。

1999年我去海德堡大学之前，即知此文，无奈遍觅不得。2000年回国后，我先得到云居寺特地给我找到的《房山文史资料》上的此作，后来又找到正式刊载本文的1998年《北京文博》杂志。2002年10月—2004年初我再次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讲学，则专门以世轩先生此文为学术教材，分析、讲解达两个月，并且在海德堡与欧美最权威的东亚艺术史学者之一的雷德侯教授（Prof. Dr. Lothar Ledderose），以及蔡穗玲博士、赵洲博士、克劳迪娅·文策尔博士等十余人对照世轩先生论文中所附拓片和录文，逐字校勘全碑。我们都深深感谢世轩先生发掘出这样重要的文献。

从1998年开始，与世轩先生神交12年，竟一直无缘谋面。我孤陋寡闻，除了《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一文之外，没有拜读过他的其他大作。最近世轩先生汇集他30年来所发表的论文，成《抱瓮灌园集》和《西山问道集》二书，请我作序，故有幸在出版之前得读书稿，始知他在民俗学和佛教史两个领域均有许多重要发现。

民俗学方面，我几乎一无所知，不敢置喙。佛教史方面，我感觉世轩先生以北京西山遗迹为根基，深入探讨，扩展研究，在以下两个课题中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一、辽金佛教史研究。世轩先生以戒台寺、潭柘寺和妙峰山三处为重点，深入调查北京西山中遗存的碑刻，结合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资料，揭示出辽金佛教的许多重要史事，特别是禅宗和礼忏方面的碑刻资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辽金佛教的认识。

世轩先生还将视野扩展到北京以外的地区，其中讨论到的辽宁葫芦岛海中的菊（觉）花岛，是辽代佛教重镇，通理大师曾经登岛访学修道，房山石经中镌刻有菊（觉）花岛上高僧大德的重要著作。本书中的相关文章，让我增添了新的知识。类似的情况，在其文集中经常出现，读者自会一一认知。

世轩先生在辽金佛教史领域里的探索研究和提供的诸多历史线索，有可能帮助学者们取得新的、进一步的重要发现。

二、智光研究。智光是明朝洪武、永乐两朝多次出使西藏，为祖国统一和汉藏民族团结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僧人，他是明朝唯一被封为法王的汉族僧人（明朝的法王，除了明武宗荒唐地自封“大庆法王”之外，其他全部是藏族喇嘛）。关于智光，很多论著都有涉及，且有多篇专论智光的论文。

世轩先生不仅详细地考察了北京遗存的与智光有关的寺庙、碑刻、墓塔，而且进一步探讨了智光的师父和弟子们的行迹，形成了有关智光的系统性研究，丰富了对于智光的认识。

世轩先生的这些论文，让我受益良多。

从世轩先生的文集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其刻苦、勤奋的学者，他对北京西山的历史文化遗存研究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读他的文章，我不时心生敬意。同时，我又感觉，他完全走的是自学成才的路子，没有接受过更严格的学术训练，因而在考证和论述中有时会出现不够严谨的缺点；文字表达也不时出现重复，不够精练。

衷心祝愿世轩先生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写出更精、更纯的作品！

罗 炯

2010年12月6日于北郊

（罗炯，安徽省人，1943年11月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致力于宗教学研究。1986年被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81年至退休前在宗教所从事科研工作。）



倾尽真情地挚爱北京历史文化遗产

岁月是久长的，我们毕竟是过客；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是久长的，我为有缘领略它的辉煌与深邃而倍感自豪与骄傲。

我的故乡吉林省梨树县十家堡镇包家屯，是个大家族，历来重视教育。解放前后族人已分布在东北各大中城市，均从事军事、教育、科研、医疗以及管理工作。北京、江西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外迁的两支。祖父包云挺，县里人称包八爷，据说他18岁就开始管理家族的地亩产业，刻苦耐劳，经营有方，有口皆碑。他在1958年深秋逝世，我才来京与父母及家人团聚，在北京西郊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969年3月（不到18岁），我作为1968届初中毕业生分配到北京重型电机厂当了一名机械工人。21岁时，同在团委写作组的孙宝丰借我《帝京景物略》，阅读后完全被吸引住了，从此对北京历史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一年家庭遭遇“昨是今非”的变故，倍感世态炎凉与险恶。1972年开始“无聊才读书”的历程，在机声隆隆的厂房里，居然要将社会、山川作为课堂，立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志向。当时世事不练达，自诩以“雕钢刻铁操觚”为乐，“雕钢刻铁”指用铣床切削加工各种零部件，公差配合要求极严，有时限定仅头发丝的1/10。生啤酒一次能喝几扎，自认就是“操觚”了，调侃、消极避世而已。厂图书馆藏有《文物》杂志近百期，我全数借回仔细阅读学习达数年，并把原缺失的两期在“中国书店”配齐后归还。

我在六年多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在北图善本部、首图北京地方文献部读书，研究了解北京地方文献、碑刻等，总量约达数千种，浏览居多。甚至连僧家的《中国佛教地理》、《拈花寺同戒录》、《潭柘寺同戒录》，日伪时期《同愿月刊》等也看了不少，视野逐渐开阔。

1978年，我受朋友之托为他妻子办转插到妙峰山公社支农。任务是普及机械化场院，滑秸炮可把小麦秸秆堆到6米高；还带了一个铣工徒弟，为公社制造了全套的生产漂白粉的设备；带领农民出身的技工们回厂内外协加工设备部件，焊花闪闪，挺有满足感的！此行不足一年却有大因缘！妙峰山有最美丽的山川与景色，有碧霞元君庙、广化寺和滴水岩。

丁家滩村南峭壁千丈，永定河奔涌，水势浩渺。4月下旬梨花如雪，峭壁上攀援的

嵘花，藤蔓叶片染绿幽暗的崖面；无数细碎的五瓣花束形成峭壁上的雪白花团，千丈悬崖如同一道雪白的、嫩绿的悬挂的幔帐，峭壁上的植物在几乎没有水分的岩石上，也要奏响它们生命的狂想曲。转插办成了，我却陷入“凤在九霄舞翩翩，我行人间山路难”的境地。

7月正午的骄阳下，在永定河急湍的清流中游泳搏击，圆润硕大的河光石缝中，肥劲的益母草、马鞭草渐吐花絮，茁壮生长。车前草肥大的叶片紧贴着地面生长，泛着浓绿的光泽。读书并印证对北京风物、历史、民俗知识的掌握程度。老铁匠为我锻制一柄钢剑，西山老僧送我一个圆形墨海，遂作座右铭“利剑古海蜗居修伽蓝，寻仙问道徜徉步春云。”

从1972年到1980年，我行我素，寻师访友，八年读书时光令我难忘。更难忘此期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耳提面命的激励与启蒙。“多读书，书要读六面”，“考证学术问题要像铁锤敲桌面一样，一凿一个坑，印痕深刻”。“清代学术存疑的问题不少，谁能圆满地解决100个疑难问题，把学术问题搞清楚，他就是一流的专家。”

《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居然从1978年创刊号开始积攒了十多期。写过诗文，练过书法，还是对佛教伽蓝兴趣最浓。史学泰斗陈垣、孟森先生的道德文章征服了我年青向学的心。

1980年5月调入北京市门头沟区文化工作办公室搞文物保护工作，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跨越。1980年以后参加学术专业会议多了起来，眼界大为扩展，在参加学术会期间，明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辽史专家陈述先生、民俗学者张紫晨教授，他们都分别希望我考取他们的研究生。终因基础薄弱不能一试，尤其是外语这道关口绝对是绕不过去的。对于我直到今天它仍是一道未曾逾越的关口。

自己认定只能边工作边学习，边实践边发现问题，解决学术问题，走读书、实践、创造的路数。“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文史学术的研究何尝不是如此！成效虽不大，但一路走来，聊以自慰的是居然能够做到年年有发现，年年有新的学术文章发表。读书加实践，日积月累，在实践中发现学术问题，并加以解决。本来在学术上，主要是能力的养成，要具备学术的敏感，能够发现问题。如果能够发现学术问题，那么离解决问题也就不远了。任何人学习的结果，最终都要用实际成果作检验，是否具备了参与解决较高层次学术问题的能力！社会肯定还是需要具有真才实学的实践躬行者的。

“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自己一直牢记着这个教导！

沿此路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聆听教诲，受益匪浅。侯仁之教授、赵洛先生、叶祖孚先生，都曾受邀到门头沟考察历史文物与风俗，指导工作。自1984年起我在门头沟区担任政协文史委员达11年（共四届），每篇选送的文史稿件都被市政协文史委选用，收益是丰富的。

除历史文物等门类外，民俗、民间文艺也随之纳入视野。今天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1982年、1983年加入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在此方面获益巨

大，加深了对民间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自觉地投身其中。八十年代初，幸遇钟敬文、费孝通、杨成志、杨堃、容肇祖、牙含章、季羡林、马学良等先生，均当面聆听过他们的讲学与开示。这些一流学者的风采、道德文章令我等后学仰慕崇敬。

1982年至1984年文物普查，收获巨大，文物工作技能得到锻炼提高。北京文物界于杰先生对我辅导关爱有加，一大批前辈的关心爱护，令我难以忘怀。我们是1980年最早开始搞文物调查的，简报发到文物局，经验推开，有了1982—1984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1984年我们建立了北京第一个区县级的门头沟区博物馆。其后计划编著《文物志》。妙峰山的开发、川底下村的开发、京西古幡会的恢复与研究，这些都是较早的文化自觉行动。对村落文化如灵水村、川底下、三家店的研究，也都是北京的先行者。一直以文化自觉的理念主导自己的工作与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孤立的，它可以指导并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1985年国家文物局专家祁英涛先生、罗哲文先生、杜仙洲先生为鉴定元代灵严寺大殿、双林寺小殿、灵岳寺曾亲临现场考察，至今这些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部已得到修复。

1981年于杰先生曾亲临东龙门涧，考察出土大量商代贝币的地点。

1982年，大家陪同罗哲文先生一起登上高峻的黄草梁七座楼敌台，风光无限。并一起考察京西内险沿河城辖下长城其他段落。

1983年元宵佳节，张紫晨教授陪同钟敬文先生、张振犁教授考察千军台、庄户村古幡会，对京西人民的民间文化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并与村民亲切交谈。

1985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先生亲临琉璃制品厂考察，他时刻关注北京古建琉璃瓦件的生产，曾多次到琉璃窑场考察指导，并留下题写的匾额墨迹。京西人民永远铭记着这位风趣而童心未泯的老学者。

1986年北大历史系许大龄等先生在市文物局安排下考察潭柘寺塔院，对明代高僧情况尤感兴趣，对我说：“小包，你把这两座塔的情况再给我介绍一下。”老教授言谈举止颇具风采，令吾辈仰慕。

1985年侯仁之教授带领研究生考察门头沟博物馆、三家店，十分有兴致地看过天利煤厂宅院，同行的有张传玺教授、徐兆奎教授。他讲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正在门头沟的淤白村考察，三天后才回到学校。

1983年至1986年，参与了民间文艺十大集成搜集整理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意义及价值的大提升，民歌的丰富与深情令人感动；灰业、煤业民间生产工艺的丰富，歌谣之动人同样令人震撼；民间舞蹈花会的奇妙深邃令人心醉。民间故事、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歌谣谚语……

我从1985年开始，学习3年社会学，曾试着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看问题，获益良多。1987年不得不为学历问题而犯愁，考入成人大专班，1990年在北大分校历史系文博专业毕业，学习的专业教材均来自北大，收益是明显的。

1995年农历四月初八，钟散文教授、中央民族大学马学良教授登上妙峰山，考察恢复不久的妙峰山庙会。

1998年北京联合大学成立北京学研究所、北京文化史研究所，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学术研究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业绩不断涌现，给社会提供了发表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阵地。高校学者引导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没有人为的把持操纵，平等待人、兼容并蓄，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在鱼龙混杂的当下，真正挑起了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的帅旗大纛，难能可贵！

北京历史、文物有众多的谜团难点，都明显地摆在那里，但大名头们都装作没看见，这需要学界新人的智慧努力加以破解。新人们对神鬼不要怕，牛气冲天的权威更不必怕，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有些仅是徒有虚名的水蝎子——不怎么着（蛰）。不要仰望谁的恩赐！新人们，只要脚踏实地，方法对头，持之以恒，努力探索，必然会有所突破和发展，打破目前止步不前的研究局面。北京历史、民间文化遗产的众多题材有待整理与研究，时间跨度长，门类繁多，每个领域都很广阔，可供研究探讨的题材是数不胜数的。

在马鞍山下石厂村有一座明代的玄帝庙，砖石门楼刻有一副明代对联：“愿天下常生好人，愿好人常得好报。”1989年危在旦夕的玄帝正殿梁架，就在我们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无奈地轰然倒塌。我们无颜面对这座明代建造的北极玄天真武大帝庙。不过三家店龙王庙即将倒塌的大殿，是我们在1986年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修复的。

本来历史文化遗产就包括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类。它们都是历史这棵参天大树上的花朵与果实，一个凝固为文物形态，一个留存在民间并传承繁衍，如民间庙会中的“中军、神耳、开路、九佛头；天平、杠箱、双石、五虎棍”，传承有序，生动有趣，底蕴深厚。仅举一例，旧时的文武香会都持有一种独特的铜锣，仅名称就有拨号、大号、神耳、佛耳、天耳等多种，称谓在民间流传但学界知之者确少，对诸如此类文化现象深入的、触及实质的研究目前也没有出现。民国时期记者笔法的表象记录已属可贵，深入内涵的研究成果还没有，当下甚至还不如从前。此类研究以顾颉刚先生开其端，奉宽、张次溪、金受申先生为代表，都是民国年间的事情。北京此类民间文化事象很多，有必要在余波尚存的当下立即切入，搜集研究整理，要有紧迫感。对于北京民间文化遗产，我们要具备一点“文化自觉”与“社会责任”理念，研究者的原动力就在这里面！“君既爱之须纵情”，当然爱好也很重要，但不如理念指导来得自觉持久与坚定。

《抱瓮灌园集》汇集了著者30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北京的事情，自认解决了一些长年困惑学术界的历史难题，今孤芳自赏地结集出版，以接受社会的检验。对一些北京历史文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难题悬疑做出的答案，其价值当下或许不显，假以年月，后代学者会体悟到所达到的学术境界；在当下的文物学术领域，一些历史文化的幽隐问题毕竟还有人在研究探索。自己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如《北京庙会

与香会》、《北京城乡古旧民居建筑艺术》等有待深化扩展，力争在今后汇集出版。

文集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蜡笔小新”中国北方销售总经理黄阳先生的慷慨赞助，他1989年毕业于北京商学院，是一位成功的并由衷热爱北京历史文化的民营企业家。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学者介绍北京称：“不到北京，不知道帝王的威严；不到北京，不知道中国的伟大！”

我爱北京，北京的伟大，绝不仅仅是皇家的、宫廷的、贵族的，它的伟大也表现在民间文化的很多方面。北京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同样也是伟大的，也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与存在。

著者于南城先农坛神仓

2009年12月8日

